

◀ （上接 2 版）

就是警幻仙子说的宁、荣二公亡灵嘱咐她规引贾宝玉的“正道”，即“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种观念当然影响世俗眼光。宝钗、袭人劝导宝玉的就是这种观念。但这种观念被宝玉斥之为“混帐话”，显然不是曹雪芹的观念。再一种是佛教、道教的观念，就是一僧一道对石头说的“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但是曹雪芹一部“石头记”，就是通过这块石头下凡的“亲见亲闻”，证明在现实人生中存在一个丰富多彩的美丽世界，这里有一群美丽、明亮、灵慧的女儿，她们追求“情”的自由，“情”的解放，追求人格平等、尊严。这就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一僧一道和甄士隐等人并不是有人说的某种神圣的启蒙者，他们传播的“万境归空”的观念被很多人接受，但是被一部“石头记”否定了。“石头记”的故事告诉读者，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有情之天下”，在这个生命的大化流行之中，最根本的最本源的存在是“情”，所以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空空道人”改名为“情僧”，《石头记》改名为《情僧录》。可以说曹雪芹最终（或在最高意义上）是用“情”充实了“空”，用“情”照亮了“空”，把“情”提升为最高的范畴。一部“石头记”的价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此。

我认为，《红楼梦》之伟大，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不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提出人的本源性问题，就在于他提出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所在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人的本源性之所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所在，就在于“有情之天下”（以“青埂峰”为象征）。而“有情之天下”并非空想，“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就在当下的生活世界，是本真的存在。

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但是人又企图超越这种有限，追求无限和永恒。宗教用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要。而在历史上，从汤显祖（《牡丹亭》）到洪昇（《长生殿》），再到曹雪芹（《红楼梦》），他们用他们的艺术作品（戏剧、小说）在寻求不同于宗教超越的另一种超越，即审美的超越。宗教的超越是虚幻的，而审美的超越虽然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不是虚幻的，不是乌托邦，尽管它可能是短暂的，《长生殿》中说的“顷刻”，甚至可能是悲剧（《红楼梦》就是悲剧），但它是真实的。而且正因为短暂，所以特别珍贵，千金难买。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康熙帝对“礼仪之争”冲突的反应

韩琦

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然而最后一次南巡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相隔仅一年多。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对南巡的目的与意义，史家多有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康熙在南巡途中与传教士多有互动，而最后一次南巡又与前五次有着明显差别。这些活动很少见诸国内所藏官方文献，幸而一些当时在场的传教士把接见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有的还刊印问世，并寄回欧洲，我们才得以一窥端倪。

台湾和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的1684年，康熙首次以巡视河工、祭拜孔子与明陵为由南巡，考察官员，了解民情，同时也借机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之后又相继南巡五次，最后一次在1707年。康熙每次南巡，凡所到之处，常常询问是否有教堂和神父，并亲自接见传教士。前五次南巡，康熙都对传教士十分友好，而最后一次则因教廷特使多罗来华，导致清廷与教廷矛盾激化，礼仪之争达到高潮。下面我们就将根据国内和欧洲所藏文献和档案，展示南巡时康熙与传教士的互动，并重点讨论最后一次南巡途中，康熙、直郡王和内务府官员在礼仪之争时对于传教士的态度。

康熙帝一生都与天主教传教士关系匪浅。1668年，杨光先（1597—1669）和耶稣会士南怀仁在午门外赌测日影，但大臣中无人通晓，年轻的康熙帝于是发奋学习西学。最初由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担任御用教师，1688年后有徐日昇、安多、张诚、白晋等人传授西学。康熙倚重传教士的一技之长，每次出巡，多请他们陪同。1682年春，南怀仁曾随康熙帝巡游东北。1696、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旦，张诚、安多也一同随行到西北，沿途观测日月食，并测量北极高度，以决定当地的经纬度，而1700年之后每年随驾去热河避暑山庄的传教士则更多。每次出巡，传教士陪侍在侧，有的作为医生，有的作为翻译，有的作为画师，有的作为天文学家，随时备询，回答康熙帝有关历算、医药、自然和地理知识的问题。西学与传教士成为康熙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他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见

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和教徒有所记录，并结集成书，陆续刊刻问世。其中《熙朝定案》记载了前五次南巡的情况，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教徒张星曜等人所写的《钦命传教约述》。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据《熙朝定案》统计，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见传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见毕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别在济南、杭州、江宁、济宁接见柯若瑟、殷铎泽、潘国良、洪若、毕嘉和利安宁；1699年在无锡、杭州接见潘国良（当时张诚、白晋随行）；1703年在杭州接见郭天宠和习圣学；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见蒙艧、杨若翰、艾斯玳、隆盛、何纳笃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见艾斯玳、郭中传和龚当信。其中除蒙艧（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艾毓翰（多明我会会士）、何纳笃（传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数是耶稣会士。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有的传教士从杭州到苏州、无锡，有的从严州到淮安接驾，有的从苏州到杭州见皇帝。康熙帝则派内务府侍卫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对天主教的关爱和对传教士的重视。见面时康熙常常嘘寒问暖，打听他们的年纪、国籍、来华的时间、住处（天主堂），是否到过北京，是否认识某某传教士等等。传教士则一般会送上“方物”（西洋礼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会收下一些礼物，作为回报，向传教士赏赐食品，赠送银两和礼物，传教士收到礼物后要照例“谢恩”。

有意思的是，为了迎合康熙对西洋奇器的爱好，传教士进献的“方物”中有许多科学仪器，如验气管、望远镜、浑天仪、日晷、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还有照面镜、玻璃瓶、玻璃彩球、万年眼镜、西药、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纸和女鱼骨珠。康熙帝特别对天球感兴趣，并让毕嘉将验气管送到北京。在与传教士的对话当中，康熙也特别问他们是否晓得天文、医学、地理等“格物穷理”知识，表明他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我们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南巡为例。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

北极阁观星台，大臣李光地得以随侍，并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帝在观星台观测老人星的活动。当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在南京。洪若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1688年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的成就，康熙帝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有意思的是，康熙帝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此作了解答。

关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南巡，《纶音特典》有记载，现附载于后：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午刻，皇上南巡，舟抵淮安皇华亭，住泊浙江严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蒙艧同江宁天主堂西洋进士杨若翰恭接圣驾，奉旨：着养心殿总领张常住引至御舰陛见，即顾问云：你们两个是何国人，有多少年纪，到中国有几年，曾到过京否，今住何堂。俱各一一回奏。又问蒙云：你在浙江严州来么？奏云：闻万岁南巡，臣即不胜踊躍，从严州特来接驾。皇上大悦。随持方物一十二种，进呈御览。谕云：你且将方物带回本省，朕到替你全收。四月初三日，蒙艧在杭州恭迎圣驾，随至织造府行宫进呈西洋方物，养心殿总领张传旨将方物收进，御览全收，天颜甚喜，即赐银九十两。又进呈皇太子方物十二种，亦着内监收进。初九日，皇上驻蹕西湖行宫。未刻，特命内大臣谕总领张传旨，次日命西洋进士严州天主堂蒙艧送驾陛见。初十日，圣驾回銮，蒙艧同衢州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毓翰、杭州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斯玳、萧山天主堂西洋进士何纳多、湖州天主堂西洋进士隆盛等雇一小舟，至谢村塘口跪送。皇上一见，即亲开龙舟窗子，以手招艧等小舟近御舰，问各臣是何国人，五臣等俱各回奏。又问云：你们在地方俱好么？回奏云：臣等荷蒙皇上洪恩，俱好。又命御前内监将御膳烹炙熟猪一口，钦赐五臣为点心云云。臣等即叩头谢恩，即随龙舟至仪金渡，蒙皇上又问：你们住那里去？五臣等奏云：恭送圣驾，叩谢皇恩，意欲

远送。皇上亲自谕曰：你们自当回去，不必远送了。臣等遵旨谢恩而回。伏念艧等西陲鄙儒，恭遇皇上慰顾颁赉，诚不世之殊恩，柔远之至意也。谨将颠末敬刊方册，少志勿忘，复思无可仰报，惟日于天主台前恭祝天子万年永享真福于无疆云尔。

除《纶音特典》之外，曾追随康熙的官员对此也有记述：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行在碑亭巷有天主堂，门首恭进西洋字册页履历黄折。钦奉皇恩，停车顾问良久，又御试西洋语文，天颜大悦，随命御前大监李带领，随驾入行宫。奉旨：着养心殿大人张常住照管，候旨宣用。（《圣祖五幸江南全录》）

可见康熙帝不仅到天主堂与传教士见面，之后还带他们进入行宫，下令养心殿官员张常住照管，等待时机咨询传教士。南京是重要的传教地，明末利玛窦进京前，就曾在南京停留，除上面提到的洪若、毕嘉之外，中国首位主教罗文焰也曾在这里传教，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有密切的往来。

我们看到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接受方物，赐食赏银，一派祥和，然而最后一次南巡（1707）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1705）相隔仅一年多。为何康熙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大相径庭？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700年前后，欧洲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进入了高潮，影响波及中国。1702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广泛征集对祭祖祭孔礼仪的看法，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一般文人和教徒，以上呈教廷，为教皇裁定作参考。多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教皇克莱门十一世（1700—1721）之命出使远东，来华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礼仪。多罗1703年离开欧洲，经印度、菲律宾，于1705年4月到达澳门，之后启程北上，于当年12月4日抵京。一开始多罗隐瞒了来华的真实使命，对于皇帝的询问含糊其辞，只是说感谢康熙对传教士的“柔远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皇帝空前热情的接待。

（下转 4 版） ➡